

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
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王成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
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王成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王成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004-8049-5

I. 中… II. 王… III. ①司马迁 (前 145 ~ 前 90) —史学—研究②普鲁塔克, C. (约 46 ~ 125) —史学—研究
IV. K092.341 K91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143 号

责任编辑 金泓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305 千字

定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摆在我书案上的是成军同志由博士论文修改加工而成的专著，作为成军同志的博士论文导师，不管是从师生的情谊上，还是从研究的兴趣上，我都愿意对这一专著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成军同志曾师从朱本源和任凤阁先生，后留校在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从事世界古代史和中西比较史学研究多年，2003年在朱本源先生和任凤阁两位先生的大力推荐下，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我的学生，进一步从事中西古史比较的学习和研究。成军对中西比较史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选定了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这一题目，之后，他潜心钻研中西史学比较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经过近五年的学习，在发表了一系列较高层次文章的基础上，写就了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会上成军的论文得到了诸位评委的好评。之后，针对评委的建议，成军同志又进一步修改，使主题进一步深入和扩展，成为现在这部专著。

成军同志在我这里学习多年，我对他的学习特点还是比较了解的。成军在进行中西史学比较时，注意对中西比较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在发表了若干篇关于比较史学理论文章的基础上，他努力以现代史学成就为依据，运用中西比较的基本原理，从史论结合的基本原则出发，对中西古典史学的共性和不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成军同志研究这一问题时，视野开阔，注意吸取新方法、新

思想。比如在这部著作中，他就运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立足于中西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下，置于中西史学发展的长河中，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进行比较详细而深入的研究，阐述他们的传记史学观念。同时，他又重视探索、吸收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挖掘中华史学精华为己任，努力对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加以正确理解，显然，这一方法不但拓宽了对两位史学家传记史学观念研究的学术视野，也有助于对中西史学及传记史学发展趋向的深入了解。

该书稿选题有价值、有新意、难度大，属跨学科题目，而且还要处理好以小见大和大中含小的关系，实属不易。将要出版的这一专著表明：成军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已有许多心得和感想，公诸同好，对于推动中西比较史学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对成军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我认为是值得赞扬和支持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成军这部专著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史学、传记史学和中西比较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的或核心问题，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长期而持久的探讨才能获得重大进展的课题。希望成军在这一成果的基础上，在中西比较这一领域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期待着他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

刘家和

2008年10月30日

目 录

序	刘家和(1)
绪 言	(1)
一、论题的意义	(1)
二、研究概述	(14)
三、主要讨论的问题	(17)
四、方法论	(31)
五、着重点和目的论	(41)
第一章 中西传记史学产生的源流及其趋向	(45)
一、中西古代的文化结构及其特征	(46)
二、中西原始文化与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	(67)
三、中西传记史学的基本结构及其精神	(80)
结束语	(88)
第二章 理性主义史学与“通变”史学之比较	
——传记史学的历史观	(91)
一、普鲁塔克理性主义史观的内涵及其特征	(92)
二、司马迁“通变”史观的内涵及其特征	(108)
三、传记史学观之比较	(125)
结束语	(135)

第三章 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对立与统一

- 传记史学的价值观 (138)
- 一、司马迁传记价值观的内容及其特征 (138)
- 二、普鲁塔克传记价值观的内容及其特征 (157)
- 三、价值观之比较——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的
对立与统一 (171)

第四章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

- 传记史学的轶事观 (182)
- 一、《史记》所表现的轶事观念 (183)
- 二、《名人传》所表现的轶事观 (195)
- 三、比较——“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
统一 (206)

第五章 文与史的交融与对立

- 传记史学的真实观 (223)
- 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文与史的交融 (224)
- 二、传记人物心灵的赞歌——《名人传》历史与
传记的对立 (245)
- 三、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对立与统一 (265)

第六章 传记人物的历史比较

- 传记史学比较观念之比较 (283)
- 一、《史记》人物的历史比较 (283)
- 二、《名人传》人物的历史比较 (294)
- 三、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的比较观念之
比较 (308)

余论	(320)
 第七章 谁与评说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历史影响及其地位 ...	(322)
一、历史影响.....	(323)
二、继承与超越.....	(338)
三、历史地位.....	(347)
 参考文献	(352)
后记	(363)

绪 言

中西古典史学是世界史学史上两个同时发生的最为发达和典型的史学形态，而传记史学则是其各自绽放的史学花园中璀璨的花朵之一。比较研究中西传记史学观念对于我们了解中西古典史学的特点，进而探索中西传记史学发展的趋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辅之以比较史学和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以《史记》和《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主要依据，通过对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以收管中窥豹之效；同时，在探讨中西传记史学发展中的相同性和不同性的基础上，进行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以探索中西古代传记史学的发展特征和现代中西传记史学发展的趋向，以加深对现代史学和中西传记史学发展趋向的理解与把握。

一、论题的意义

（一）“古典时代”的内涵及其意义

“古典时代”（the classical period）是西方人对希腊罗马时代的一种带有敬意的称呼。在度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西方终于迎来了其新时代的黎明——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西方人发现了在中世纪之前他们几无所知的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在他们看来，这一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文明形态达到了他们所

认知的古代世界文明的典范。所以，“古典时代”这一专门术语充满了西方人由衷的自豪感。

自不待言，西方从希腊文明开始，就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哲学、思想、艺术、戏剧等等，都奠定了自己独特而高度发达的历史地位。美国著名思想家罗伯特·宾厄姆·唐斯指出：“那些自以为找到了一条从来没有被人踩踏过的路径的现代思想家，迟早会为自己而感到害羞，因为他们会发现在这条路上早有希腊人走在他们的前面了。”^①恩格斯也精辟地指出：“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②比如在哲学方面，恩格斯也认为：“总的说来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③其最突出的代表性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大家，他们的哲学成就不但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而且还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直到今天还在散发着它们具有永恒意义的魅力；在戏剧方面，希腊出现了荷马和众多的悲剧作家，从此，西方的艺术及其成就不得不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烙印。而且“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道路。有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渣，例如原子论，当作永恒真理，另一方面却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理由是他们没有经验自然科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是愈来愈少了。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这种见解迈步前进，达到对

① [美] 罗伯特·宾厄姆·唐斯著，王宏方等译：《塑造文明和心灵的巨人及其思想》，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③ 同上。

希腊哲学的真正的认识”。^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希腊高度发达的文明与文化经过善于学习的罗马人的吸收、融合与传播，遂成为西方世界最具特色的古老而发达的文化系统，被后人并称为希腊罗马文化。不言而喻，这一文化形态不仅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可企及的范本，也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极大，以至于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当它每一次面临重大课题而要获得突破时，都不得不首先回过头来重温过去古典时代的成就，从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和营养，从而迈向新的文化高度。正因为如此，西方当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希腊这一时期的重大的人类文化创造称为具有突破意义的原创性的文化。而且在雅斯贝斯看来，“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自那之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②

当然，雅斯贝斯的这个观念同韦伯提出而帕金森斯进一步阐明的四大文明古国（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的“哲学的突破”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旨在说明这些古老而又有活力的文明对人类所做出的和正在继续作出的杰出贡献。

同时，在这一辉煌的古典时代，其历史学的成就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史家辈出，群星灿烂，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如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全称为《希腊波斯战争史》），开创了希腊和西方的历史思维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页。

② [德]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式；紧随其后的则是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塞诺芬的《希腊史》这两部史学名著，特别是古典时代在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及其代表作《通史》，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编年史》、《罗马史》，等等，他们以其丰富而生动的历史记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鲜活而真实的希腊罗马历史画卷；还有在希腊时期就已成为重要史学形式，而在罗马时期特别发达的传记史学，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恺撒传》等等，他们以生花的妙笔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人物形象，构成了古典时代历史人物的“画廊”，大大地丰富了古典时代的历史文化内容。不过还得强调的是，古典时代的这些史学家既以其敏锐的历史触角，深刻地记叙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又以其杰出成就而彪炳青史，成为时代的代表者。这些都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最初典范，并吸引着不同时代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进行深入探索。

如果与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相比较的话，中国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发达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的历史意识和观念的产生由来已久，东汉班彪曾据前史作《史记后传》数十篇，其《略论》认为尧舜时代即有记史之官：“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①刘勰更认为记史始于轩辕黄帝之时：“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②当然，太古史书因皆佚缺，实情渺难追寻，仅以具备了记言记事史籍体例的《尚书》与《春秋》来说，就比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要早，而同希腊神话相当。所以，中国史学发生之早，典籍之博，

① 范晔著，李贤等注：《后汉书》第三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

② 刘勰著，黄叔琳注：《文心雕龙校注·史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5页。

在史学方面的创新和成就，在世界各国中，可谓首屈一指，更是有目共睹。西方哲学大家黑格尔就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有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以特殊地面目出现。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①当然，现在看来，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因为其后所涌现的一系列古代文明的考古成就——埃及、两河和印度的古老文明都证明了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尽管如此，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在强调中国历史学的悠久和发达方面并没有过时，对于我们比较研究中国史学的历史地位仍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同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相比较的话，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古典时代，这就是先秦与秦汉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及其实质同西方的希腊罗马的意义相类似。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认为：中国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大众的共同信念和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去实现先秦前人的理想。而秦汉的历史性功绩，则是“根据先秦人的观念与理想，对于他将来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形态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②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先生还认为：“中国文

① [德]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1页。

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讲究陈设，再在此园里布置花草。至于全部设计，则在先秦时代早拟成一个草案了。”^①

如果仔细探讨钱穆先生所说先秦设计的草案的内涵的话，就会发现，钱穆先生所指的“草案”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在其早期阶段形成的某种内在的文化结构，换言之，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就在于这些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文化内容，而且这些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文化内容对中国以后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如果将钱穆先生的这一重要论断再同中国传记史学，即司马迁创立中国传记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相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钱穆先生的分析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研究的基础之上。显然，他的这一分析同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的思想突破观点有相通之处，都强调了在文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关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关节点的内容对其后的文化系统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许他们的论断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他们的论断之深刻仍是值得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仔细玩味的，这也是本论题的最深厚的理论基础。不过，在此想要强调的是，中国传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西方古典时代对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所以，钱穆先生的真知灼见高度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4—165页。

评价了中国先秦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这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中西古典史学的异同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古典时代的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史上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中国，人们常常把他的《史记》称为纪传体史学的杰作，其原因在于这部历史巨著的突出特征就是叙述上下三千年、数以百计的众多历史人物。至于《史记》中到底有多少篇人物传记，由于各个学者所依据的标准不尽相同，所以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如果说《史记》的核心为包括了一百多篇人物传记，这些历史人物交错纷呈于“本纪”、“世家”和“列传”中，而最为集中在“列传”这一部分，应该不会有大的争论。

从现存资料来判断，司马迁是中国传记史学的创始人，因为在他的巨作《史记》出世以前，我们还不能找到任何一篇可以真正称得上“传记”（Biography）的作品，同时，《史记》的意义不仅是传记史学的杰作，而且它还奠定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模式”。正如清人赵翼所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一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①显然，司马迁是传记史学最突出的代表性人物，但仅仅如此认识，还不足以深刻认识司马迁及其《史记》所应有的历史地位，我力求突破《史记》研究所固有的时空局限，将《史记》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同西方当时最发达的希腊罗马史学相比较，为《史记》所包藏的史学价值，能对东西方古典史学的内在特质有更深刻的了解做点贡献。

当然，东西方史学各具特点，各有其参照标准和价值标准，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很难在全世界各民族中去寻找同一的历史思维模式以判断孰优孰劣。诚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想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① 史学发展史表明，历史学理论和历史科学是同时产生的，史学理论标志着历史学家和其民族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在承认历史思维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性的同时，还应看到，从比较史学的角度而言，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民在其历史发展中还具有共性的可比较的理论思维形态。对于本论题而言，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找出中西史学思维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共同点。中西这一共性理论形态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它通过抽象概括的手段，舍弃了中西民族历史学发展的特殊性，从而能够充分显示其民族历史意识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是它是超历史的。”^② 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在中西史学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中探索其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以了解中西史学，特别是传记史学观念的共性。在此强调的是，这只是我们比较研究的一方面，而绝非全部，还要继续努力探索的是，在这一共性的比较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在同中求异，以求对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思维特点给予更为深刻和清晰的具体理解，并努力探讨形成东西文化不同特质的历史背景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源头。这也就是马克思还着重强调的：“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② 同上书，第342页。

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①因而能否掌握史学比较内在的普遍与具体的辩证关系对于史学比较的成败十分重要。

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也指出：“在世界史学的园地里，中国古典史学无疑是一朵自有异彩的奇葩。要阐明中国史学对于世界史学已经作出的贡献，我们不能置我国古典史学于不顾。同时，作为一种传统，我国古典史学对于后世以至于当代史学不可能没有多方面的、人们意识或不曾意识到的影响。因此，要我们发展当前的史学和史学理论，以求对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也不能不对中国古典史学从理论上进行深入反省。这种反省既可以结合纵向的前后历史阶段的比较来作，也可以结合横向的与外国古代史学的比较来进行。”^②刘家和先生的这一观点深刻指出了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对于我们更好地从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两者比较极具意义。

当然，为了使这种比较不失于空泛，就必须选择一个史学成就高，且能最充分体现上述要求的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首先，我们想到了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但中西方史家都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历史》并非传记体史书，而是叙事体史书。因此，经过再三考虑，本书选择了西方古典时代的、集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于一身的、罗马帝国时期杰出的传记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作为希腊罗马传记史学的代表，而同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进行比较。

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是生活于罗马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② 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载《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